

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

# 張春桥、姚文元同志的讲话

根据录音整理，未經本人审核  
不准轉抄翻印，只供內部学习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徐汇区联络部整理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 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

## 姚文元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着一片大好形势，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三结合夺权的经验正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斗争中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我们应当满怀信心，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需要夺权的单位，进一步向党内外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把革命进行到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大的胜利！

一月革命的风暴中，我们自下而上地从市委和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中夺权，成立了自己的三结合的最高权力机关。

近，张春桥同志和我到了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了上海的工作，参加讨论了现在已经发来的一系列的重要文件。

同志们，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我们亲自听到了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指示；亲自听到了毛主席对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巨大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热情的支持，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主席的指示是我们革命征途上的指路明灯，是我们革命人民的无价之宝。毛主席指出：“二、三、四三个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这三个月中文化大革命要看见眉目。”我们前的工作就是要把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声音广泛传播到全市革命造反派和革命人民的心中坚决地贯彻执行，化为我们的实际行动。

主席说过：“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分析形势，总结工作，明确当前的斗争任务。要进一步发挥上海工人阶级革命人民那种大无畏的革命首创精神，我们要继续前进；我们要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批判和克服资产阶级思潮，提高我们的无产阶级觉悟；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巩固和扩大革命人民的大联合；按照毛主席一贯的指示和政策，正确对待干部问题；普遍地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反革命；及时地识破、坚决地粉碎阶级敌人各种新反扑！

同志们，最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并就当前的形势任务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了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们把讨论的结果报告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并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

今天，将由张春桥同志向大家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并且布署当前的任务，会上要宣读当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的草案，供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讨论和试行用。张春桥同志的传达希望大家不要去张贴，希望大家不要去张贴，因为今天讲的一些东西还是作为内部传达来讲的。现在我们就请张春桥作报告。



## 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

### 張春桥同志的講話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讨论问题了。刚才姚文元同志说了，我们最近到北京去了，我是十二号去的，是毛主席要我们去的。现在有一张大字报说张春桥为什么又到北京了呢？那我要可以答复：是毛主席要我们去北京的。

我们到了北京以后，毛主席当天很快就接见了我们，后来主席又召集了中央会议，讨论上海的工作，还有其它的问题。在我们离开以前，毛主席又接见了我们。刚才姚文元同志已经说了我们首先应该向同志们汇报的，就是主席的身体非常非常的健康。而每一次谈话的时间都是很短的，但是主席的精力非常旺盛，始终都很愉快。每一次谈，对上海的情况非常熟悉，好多问题海的情况只要我们提一句，主席就知道了，他就可以讲一些地方的情况，非常关心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在北京一个星期，每天都感觉到这一点。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党中央各个方面的同志，对上海的文化大革命都是非常的关心的，使得我们非常的感动。我们知道，我们两个人和主席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一再地接见我们，还只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我们感到是光荣的，我们知道我们是代表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去的，我们代表在座的同志们去向毛主席汇报的。毛主席对于上海的革命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所取得的成就，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一些，同志们都是知道的。过去已经给我们很高的评价。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上海各革命组织所发出来的《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都是毛主席当时一看到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就很快看了而且很快决定了向全国广播。在这次谈话里面毛主席又说“上海的工作总的方面是很好的。”他就讲了一下这一段历史；比如说，上海工人，在安亭事件那个时候，他讲：你上次去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两千人吗？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一百万工人了，工人组织将近一百万了，这就说明上海工人群众发动的比较充分。毛主席对各个方面的情况都问了我们，学生的情况、农民的情况、机关干部的情况、各个方面的情况都问了，机关的情况，甚至于也问了市委一些干部的情况，我们都汇报了。他还问到，比如说有些细节问题他都晓得，他问：“你们那个时候，学生不是都到了码头吗？那现在这些学生是不是还在码头上啊？”我们当时说：“当我们陪卡博同志到码头去的时候，我们还是碰到很多学生还在那里。”主席说：“很好！”他对学生的关心，对工人、对农民、对机关干部、对解放军对上海部队的情况都是非常关心的，而且对上海的革命群众的每一个好的创造，每一个革命的行动，主席都无微不至的关怀，了解。我们感觉到主席对上海的关心，这对我们上海革命造反派来说，对上海的革命群众来说，是对我们上海人民的最大关怀，也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有了毛主席的支持，有了党中央的支持，我们面前不管有多少困难，不管阶级敌人还会玩弄多少花样来反对我们，他们都没有办法来阻挡我们上海的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去争取一个又一个的新的胜利。

我想下面来分别地说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讲一讲夺权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在主席那里谈得比较多，这个问题我也想讲的多一点。

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是从上海革命群众夺权开始的，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所讲的“一月革命”的风暴开始的。我们大家都知道，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来说也是解决政权问题。但是，我们这一次的夺权，夺取政权，和一九四九年我们从国民党手里夺取政权是不同的，有它不同的方面。毛主席这一次跟我们谈话的时候说：这一场革命，我们现在这个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同志们，注意主席这一句话，他说：“这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这个革命是我们发动的。这个我们就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的，是毛主席自己发动的，自己亲自领导的。这一天，他是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考虑一下，写一篇文章，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他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对这一句话，我想就我们的理解在这里解释一下。照我们的理解，主席说这个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就是说，我们十七年来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昨天《红旗》杂志的第四期的社论里面说了这个意思。就是十七年来，从根本上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不是刘邓路线占了统治地位。这十七年来，我们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正如不能说，十七年来，我们的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或者说刘邓路线是占统治地位，那不能作这样的估计。所以主席这句话前半段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点应该肯定的。那末后半句呢？后面就是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怎么又要革命呢？为什么要革命呢？毛主席说，那天这个问题他解释了他说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要革命。毛主席的这句话是辩证法的。他先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又说还要革命。为什么要革命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政权中间有一部分，不是全部是资产阶级的，就是被篡夺了的，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那么一小撮人篡夺了。所以还需要革命。

有一个地方，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是一个反动的口号。为什么？因为所谓“彻底改善”实际就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所谓彻底改善就是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行了，要彻底地改了嘛！正确的说法，只能够是部分地改善。这是讲，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个问题。为什么又说这个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呢？事实是如此，是我们自己搞出来，是毛主席自己发动的。为什么要自己发动这场革命？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已经统一了十七年，这十七年来比较稳定。大家都很满意嘛。中国至少一百多年没有统一，四分五裂很不稳定。现在经过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们国家统一了，稳定了。但是事情总是这样，统一、稳定是它的好的方面，但是它带来了问题，就是在这个比较稳定中间，实际上也不稳定，而且有一部分政权，党权，财权，文权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

毛主席发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正是为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得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能够把修正主义根子挖掉，能够使得我们的祖国社会主义的祖国不会变颜色。我们感觉到毛主席提出这一个思想，这是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个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从这一句话主席常常是这样，他把很复杂的事物最后就变成了一句话，所以这句话非常重要，能够启发我们去想各种问题。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一点对我们当前的夺权斗争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认识这句话，我们就看不到发动这场革命的必要性，也看不到这



場斗争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 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很好地懂得了主席这句话的意思, 那我们就能正确地按照主席的思想来办事。这是关于夺权里面我想传达的第一点。

第二, 在夺权斗争里边, 在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 成为问题的中心的是“三结合”问题。这是能不能够夺权, 夺了权能不能巩固的关键。

我们大家还记得, 在我们上海, 对于上海旧市委、旧市人委的权, 已经被夺过好几次了。一月十四日上海市二兵团, 他们夺了一次, 发了通令。一月二十二日上海市还有其他的四个单位又夺了一次。一月二十四日红革会和其他单位又夺了一次。但是他们夺到了什么东西呢? 他们夺到了几间房子, 有的就把市委还有华东局大印抢到手了。就因为这个印拿到手了, 就认为权夺到了, 但实权呢? 根本没有夺到。你们在座的可能根本不知道。他夺权了, 那末应该发号施令了, 我们也不知道, 他的权说是夺了, 但是他说了话也没有人听。市委的权是这样, 华东局也是这样。我在这里讲华东局机关, 也夺了好几次了, 到现在你说夺下来了没有啊? 我看也就是那样, 占了几个房子。大概还有些人强迫魏文伯、韩哲一签个字, 要点东西, 搞个汽车什么的。这些大概夺了一些, 别的东西夺不到。我们在上海工作我们没有得到他哪里对我们上海有什么影响, 我现在劝夺华东局权的人, 那个权还是不要夺了吧! 要夺就要搞“三结合”, 你也没有办法“三结合。”这事情将来专门跟他们谈, 因为我在中央讨论过一下, 华东局的权不能这样夺法。华东局书记处的权是不能夺的, 华东局书记处是党中央的代表, 那末你夺权, 就是向党中央夺权了! 要夺只能夺华东局机关, 华东局机关就是一点房子, 有什么好夺呢? 在这里我就讲一个市委, 华东局机关, 其他单位, 同志们知道的比我多。有些局, 有些县, 有些区, 有些企业工厂, 夺来夺去, 结果谁也没有夺下来。这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说明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来大联合是夺不了权的。没有一个大联合, 几个单位, 一个单位或者两个单位去夺权是夺不下来的。那种小联合的夺权, 或者一个单位, 二个单位的夺权它只能产生小团体主义。有些单位去夺权, 去夺了个印刷厂, 夺了印刷厂以后这个印刷厂就归我这个单位了, 别的单位来印东西就不准。这种小团体主义的夺权, 实际上是把全民所有制变成了小团体所有制, 这是破坏社会主义的。我们每一个工厂, 每一个机关, 每一个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的, 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和个人, 怎么能属于一个小团体呢? 如果那样的话, 就变成小团体所有制, 从全民所有制变成小团体所有制这实际上是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经济, 是南斯拉夫的办法。我们这个话说得尖锐一点, 是为了告诉这些同志这条路是不能走的, 是南斯拉夫的办法。什么工人自治呀, 小团体呀, 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都懂得, 懂得了大联合夺权, 要大联合夺权, 还不是说得很清楚, 要大联合需要找一个恰当的形式, 这个恰当的形式, 就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三结合”, “三结合”, 同志们是知道的, 这就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人民解放军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这三方面缺少一方都不能说是大联合, 所谓大联合就不在于有多少群众团体都参加了, 当然应该凡是革命的组织应该联合, 这个思想我们已经宣传很久了。现在的问题不仅是说群众团体越多越好, 而是说, 如果缺少另外二方, 只有革命群众组织, 没有人民解放军, 没有革命领导干部那么这个权是夺不下来的, 夺下来也不能巩固。所以主席这次和我们谈话, 谈得最多的是“三结合”问题。我们很好地思索了主席的这个指示, 考虑了、想了这个事情, 和一些同志交换了意见。在北京恰巧碰到了山西的同志, 山东的同志都到中央文革汇报工作。山西的同志汇报的一天, 我们参加了, 山东的那天汇报, 我们就回来了, 没参加。从各个方面来看, 山西大约特别明显就是军队的作用。山西的夺权, 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 根本夺不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山西省委, 反动透顶了, 而且已经准备了武装, 搞了那么一批便衣特务, 发了枪。象刘格平同志, (夺权的领导干部,

原来的付省长)就在他住的房子的对面, 就有两个特务, 有枪, 窗口就对着他们门口, 随时准备把刘格平捉起来。如果他们不夺权呢, 再过两天, 现在出来的这一批革命领导干部就都被捉起来了, 人民解放军坚决站在革命派的一边, 支持革命派夺权。这样, 这些手里枪也没有的革命群众才把权夺下来的。

刚才我们读毛主席语录有这样一段话: “没有人民的军队, 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没有军队的政权, 在世界上, 在阶级社会里, 是根本不存在的。你要想夺权, 又没有军队那怎样可能呢? 我们夺国民党的权要有军队, 那是要靠军队打天下。今天我们把一部分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夺回来还要靠人民解放军, 来支持, 没有这个力量是不行的。没有革命的领导干部行不行? 这也是不行。因为群众只要一采取革命行动, 必然要有干部。比如说, 我们革命造反派, 建立一个战斗队总有一个负责人, 不管名字叫什么, 有的叫服务组, 有的叫勤务员, 有些人不喜欢这个“长”字, 不愿叫战斗队的队长。但是不管叫什么, 总是有领导人, 总有干部。现在我们要夺权, 总要有干部。无非是有新的干部, 老的干部。新的过去没有担任领导工作的, 还要有些过去担任过领导工作的。为什么要有一批担任过领导工作的革命领导干部呢? 因为事情很明显的摆在这儿。一个工人同志他不管多么好, 革命积极性非常高, 也很有工作能力, 在这文化大革命里边有很多的贡献。但是马上把一个城市比如说上海市或者一个省, 比如江苏省, 交给这样的一些工人同志来管, 是很大的困难。因为他没有经验嘛。如果他管一个车间可能比较熟练, 管一个大的工厂就已经困难了, 如果把上海市统统交给他, 这个困难当然大。你们工人造反派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同志, 很有才能, 现在马上交给你们, 你们有困难。现在就拿我来讲吧! 我总算做工作还做了一些年了, 现在要我负责上海市的全市工作, 我也是感到非常吃力。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事情我过去没什么管过, 我的精力并不是那么宽, 现在一大堆问题摆在面前, 过去有的时候, 我也顶多参加一些讨论, 但是做决定不是我做的。很多事情我根本没碰过, 没有摸过。经济工作, 工厂工作, 我也知道得很少, 商业知道一点儿, 也不多; 象财政税收这些事, 我自参加工作以来, 我在这里可以向同志们坦率地讲, 我从来没有兴趣, 有些文件送到我眼前我都看都不想看; 好多事, 农村我知道一些也不多, 本来这种感觉, 比如说在柯庆施同志在世时, 那时候我们总觉得, 虽然我们也担负着很重的责任, 和我们的能力不相称, 但是那时候也觉得好办, 但最后觉得问题不好办, 就跑去找柯老商量一下, 他下个决心就办了。柯庆施同志六四年一病倒, 六五年去世, 那个时候我们突然就感觉到肩上的担子就挑不动了。这个担子突然往我们身上一加, 我们感到没有一个地方商量了, 担子越加越挑不动。在客观上面临的比那个时候要多了。那么一个普通的工人同志、学生, 我想他们遇到的困难会比我们要多。

我在主席那里谈到, 我们一个大学生刚刚毕业, 有的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要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主席那天就说, 我看当一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 学校很复杂, 你是在一个学校里刚刚毕业、还没有毕业, 全校的情况也还不了解。主席这样讲, 照我看, 当个系主任也不行, 做个系主任总要有学问吧, 你这个学问刚刚没学完或者大学刚刚毕业, 你学问还不多, 而且没有教书的经验, 没有管理一个系的经验。搞个学主任嘛, 总是我们已经培养的一批讲助教师, 都要那些人出来。

那天还讲到, 主席说, 有些老的人也不能够都不要, 当然啰, 周谷城再教书恐怕不行了吧! 看哪些人还行呀? 他也是关心这个事。我说了这些话, 同志们, 特别是青年同志你们不要泄气呀! 说主席怎么又说了这些话, 主席是说, 青年同志很有希望,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里边, 他们作了很大贡献。但是现在马上来接这个班, 就是接省委书记, 市委书记这个班, 有些困难, 要有一个过



程，还得学习。“三结合”，我们理解也是帮助青年同志学习的一种方式。老的考虑这个问题要从培养接班人来看，这个班怎么接呢？看起来“三结合”不但是夺权的一种形式，而且是老的带新的一种形式。大家在一块儿工作嘛，学个几年、七年、八年、十年，现在如果二十来岁，学十年，三十七岁，做省委书记那不是还很年轻吗？所以，主席对青年同志从来是热爱的，主席也评价很高。但现在不能够单单强调那一点。因为我现在今天讲的主要是讲“三结合”的问题。这就不能不说“三结合”的必要性。不能够不说到我们的青年工人同志、我们的学生同志，马上接这个班还是很困难的。拿我们上海的情况来看，我们上海的革命群众的组织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个问题我已传达了，主席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刚成立的时候，不是实行了“三结合”，那我看，人民公社的那个牌子早就给人家砸掉了。你们说，没有这个危险吗？有这个危险的！因为第二个人民公社第三个人民公社又在筹备了嘛，他就不要砸掉这个牌子？连在外滩人民公社委员会办公的地方警卫连的同志他们都向警备区首长请示，这个牌子有人来砸，怎么办？因为互相砸来砸去吗，砸这个牌子怎么办？那警备区首长下了绝对的命令的呀！谁要砸这个牌子当然是反革命，捉起来。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参加了公社的三结合，如果不是在这里过高的估计我和姚文元同志的力量，我们两个没有什么，但是我们两个是参加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工作的，就这么一点身分参加了工作，这就使得有些人要反对人民公社不能不考虑一下。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夺市委、市人委的大权就夺不下来呢？为什么我们这样“三结合”就把权夺下来了呢？那么就是因为“三结合”，如果不是这样的“三结合”，这个权是夺不下来的，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它今后也是这样，就是“三结合”的。下面我们就讲“三结合”还会继续加以充实，加以提高。它的基本力量有三方面代表，这样的基本形式已经形成，我们加以充实，加以提高，这个市的革命委员会就会更加巩固，谁要反对这样一个组织那不单是所有革命组织会起来反对他的。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会来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样一个临时的权力机关它就可以形成绝对有威信的，有权威的，可以来领导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机构现在是有权威的，在将来更加有权威，更加有力量。有些人总想来试一试，想来反对我们，过去想反对人民公社，现在还想着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就请他试一试吧！我们已准备好了，谁要想着来碰一碰，我们就会有方法对付他们。

这是我讲的第二点。就是一定要实现“三结合”，这是主席给我们反复谈的一个问题。

先讲了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要搞这个革命就得大联合，大联合最好的形式是“三结合”，我们现在的問題就是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现在应该在市一级扩大这个“三结合”，同时在以后各个夺权单位需要夺权的地方来进行夺权的时候，我们都要实行“三结合”，有没有可能实现“三结合”呢？上海市有600多个部、局长以上的干部，处长以上的干部是6000多个，难道说，从这6000多人，600人中都找不到“三结合”的对象？这个不可能。可以找到，而且应该说，这6千多人，我是讲处长，还没讲科长，科长就更多了，这么多人里面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这一点应该有充分的估计。当然啰，上海的革命的干部或者是整个的干部造反的比较少，而且造反比较晚。上海机关干部造反是一直到12月18日开大会，那才算是开了炮。这已经是相当晚了，但在全国还算是好的，还是比较先进的。当时，毛主席看到这个消息很高兴，说：“上海的机关干部也起来造反了”但整个数量来说不是很多。在12月18日起来造反的干部中间还是一般干部比较多。市委书记一个造反的也没有，付市长一个造反的也没有。这个事情当然不能怪革命造反派，这个不能怪革命群众，这个，应该他们自己负责，谁叫他们不造反？这个事情我们没办法替他们负责，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首先应该是陈丕显、曹获秋应该

负责，他们对干部是欠了债的。他们自己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大批干部带坏了，总是为首的嘛！同时据我知道中央的很多指示，在上海没有很好地向干部传达。不但在座的很多同志，很多一般群众，一般干部没有传达，包括有一些跟随他的干部，甚至市委里的人也没有传达，这样使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不能传达到群众、传达到干部中间去。

十一中全会回来以后，传达了什么？没有很好传达。据说市委的会，开常委会还是委员会，曹获秋传达了一个小时，那怎么行？那样子传达的什么？中央工作会议他们也没有很好传达。据我们听说象十一中全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根本没有很好地告诉群众、干部。所以当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一冲市委，一提炮打司令部，上海的干部莫名其妙，什么炮打司令部。所以很多事情是应该由领导负责，应该由为首的人负责，有些事情他们根本没有传达。正如同志们知道的“安亭事件”那个事情他们传达谁的指示呢？传达陶铸的指示。曹获秋就是给陶铸打电话，陶铸就跟他说了一通就那么口气：“春桥既然已经同意嘛，就只好这样了嘛！再继续做工作嘛！就改过来嘛！”曹获秋就是根据这个来办事的，他就只信陶铸的。伯达同志的意见，到后来主席的意见，我都告诉了市委，市委不但没有向一般干部传达，连市委书记处都没有传达，连马天水都不知道，马天水所以跑到工交会议上放炮，那当然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是，后来我在北京开完会时，他就告诉我说：“我不知道主席的意见”。所以他敢于跑到中央工作会议上继续攻击我。他不知道主席的意见，我想这个人他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而是陈丕显、曹获秋那些人就鼓动他，说你到北京好好的讲，什么话都讲，鼓动他。你说这个人陈、曹这样的人，他们欠债实在欠得多，不但对上海的人民欠了债，对干部欠了债，对周围的同志也欠了债。同时他们又用什么“内外有别”呀！“组织纪律”呀！“什么东西不能讲呀！”所以干部被压在那个地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我前面讲了，首先由他们负责。但是领导首先应该负责，这个不能怪我们，不能怪革命的群众，我们相信他们中间，六千多人处长以上还有六百多个部局长以上的干部，我们相信他们多数是愿意革命的，是愿意跟着毛主席走的，不然的话，我们就没办法解释这样的问题，同志们，为什么当柯庆施在世的时候还是这些干部，又为什么在柯老领导下就能够执行主席的路线，就能够紧跟着毛主席，把上海的工作做得不是比较好吗？特别是柯庆施同志主持工作时期，特别是五八、五九年以后，这个时期上海的工作在全国是比较好的，还不是这些干部？还不是六千多个领导干部？还不是六百多个部局长。我不否认他们中间有一小撮坏人，但是我是讲多数。这些同志那个时候在柯老领导下他们做出了很好成绩，我们刚刚念语录，不是说要按主席指示，看干部不但要看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全部历史，那么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些干部十七年来的表现，可以加以对照。很多干部那个时候，在柯庆施同志在世的时候他们是执行了主席的路线，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们的表现也不完全是相同的，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个样。我们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

毛主席这一次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又一次对我们讲，我们应该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会跟着我们走的。这里讲的我们就是跟着毛主席走。主席还特别讲到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相当多，中农占的数量很大，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包括小业主这个数量相当大，毛主席说，只要我们善于引导，他们也会跟着我们走的，主席在任何时候他都是一再强调，我们要相信大多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不相信大多数，就是不相信大多数人是革命的，结果使自己完全孤立起来。实行“三结合”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对待干部问题，《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里面有一段专门讲正确的对待干部问题，第四期又专门写了一篇“正确地对待干部问题”这两篇社论党中央都讨论过的，毛主席看过。头一篇主席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正确







排排队，最好选择几个标兵，选择某些人代表哪些类型，有了几个标兵就行了，好办了。当然是对革命造反派同志说的了，我们希望我们大家要向那些干部去做工作。我们也希望他们坚决站过来，你既然承光靠我们做工作，不站过来不行呀！他们现在有许多顾虑，说晚了，说早了没有站过来。你既然承认早不站过来是不对的，现在还不站过来，不是越来越晚了吗？还等到什么时候呢？党和人民是欢迎他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鲜明的，犯了错误，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只要坚决地改，党还是欢迎的。而且犯了错误，也有好处，犯了路线错误可能因为犯了一些路线错误就增加了免疫力，在以后就少犯路线错误和不犯路线错误，也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嘛！有人说双方感情合不来，斗了一场又怎么与他一起做工作，我说谁斗的，还是谁来做好事，因为我们是根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嘛！

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是毛主席的学生，我们斗是根据毛主席的路线，现在搞“三结合”还是根据毛主席的路线。在这一点上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己应该首先把感情转过来。他们决不能对革命造反派记仇，准备“秋后算帐”，打击报复，这是不允许的。如果真正认识教训，就应更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斗了一下，可能有的过分了，应该谅解。我们对你们执行毛主席这条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难道你们对革命造反派就不执行这条路线吗？还要无情打击？那当然不行！小将们有些做得过份地方，那也只能谅解。任何革命都要付出代价。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决定中国命运的革命，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样一个伟大革命，难道不应该付出代价吗？我们看，现在的代价并不大，比起资产阶级革命，我们的代价并不大。法国革命、英国革命、德国革命，他们的反复、夺权，反夺权，那个代价大得很，我们的代价不大，自己挨了斗，也算一种代价。我看，有的斗得完全对，有的有一点过份，那么也就不过是那么一点吧？也算一点代价，也就算你对革命的一点贡献吧！

老实说，没有革命小将那样英勇，那样敢想、敢说，那样英勇地冲锋陷阵，上海的阶级斗争盖子是揭不开的，这个功劳谁也不能抹煞。如果没有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没有毛主席的领导，象有些人我们能够掀得出来吗？能够把上海的面貌能象今天这样改过来吗？不可能的！谁要是看不到主流，看不到主要方面，那么就证明这些人现在还没有了解这次革命是干什么的。我们劝说一些人你们想一想大局吧！想一想这一场伟大革命使得我们国家面貌，国家命运不是几天而是决定我们几十年、几代的问题，即使自己即便有点什么不愉快，也应该改过来，应该看一看大的方面我们要继续搞“三结合”，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我们希望所有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包括市委书记处内部的人，如他们愿意革命，愿意跟毛主席走下去，那我们都准备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考虑他们的问题。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我们希望这些犯了错误，以至犯严重错误的人，在这紧要时刻考虑一下自己究竟还愿意不愿意跟毛主席走。还愿不愿意改正错误，是坚持不改还是屡教不改呢？还是马上改？现在是紧要关头，不能再拖延，请他们自己考虑。这样，我们的“三结合”、我们的夺权斗争就能很好地进行。

下面谈一下“三结合”夺权的组织形式问题，政权组织形式问题，还讲一下上海人民公社为什么要改名字的问题。

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谈话中也作了详细的指示。毛主席说：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那据我看，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是巴黎公社；再一个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从现在的苏

维埃看来，已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了。主席还说：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嘛？美国是总统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是王国，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一个好一些？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点。就现在的表现来看啊，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天王，唐高宗（即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他说，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要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我们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一个名称，是一个词，好象校长就低得多，总统就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所以主席说，名称不易改得太多，还有历史上的王莽这个人是最喜欢改名字的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如现在有人不喜欢这个“长”字都王莽（西汉），王改了，他是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通通改了，主席说有点象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后仍不记得还是记老名字。王莽皇帝下诏书都困难了，改得连县名都不知道了。把老名单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公文来往非常麻烦。主席还说：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主要经验是巴黎公社、苏维埃，也可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如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如苏联一样，他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共和国。这个问题主要是看那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所以是不是咱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都改名了。

现在出了个问题，各省、市都想叫人民公社，与上海一样，有的地方也叫了。最近主席反复在考虑这个问题。最初没有那么想，如这样想下去，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主席说：这样就发生改变政体，国家体制问题，国号问题。是否要改为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改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出来这个问题，紧跟着改，不但出来这个问题，如大小都要改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主席说：“这问题我估计苏联是不会承认的，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了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中国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问题，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认”。还有一个问题，主席考虑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党放在那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哪里呢？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个党呢？所以毛主席说：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他说：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他还跟我们研究。大学里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因为这是十六条所规定的。我们上海有个叫生产委员会，可以叫革命生产委员会，现在也有叫文化革命委员会。简单地就可以叫革命委员会。工厂也可以“三结合”。这种委员会也应该是“三结合”的。应该有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干部）应有工人（老工人、青年工人）还应该有民兵。就是说名称，主席的意见是原来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都不动了。将来还叫国务院，这不必改名字了，市仍叫市人民委员会，这也不要改了。毛主席又说上海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啊！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啊？他要我们你们是不是回去商量一下，想几个办法。第一种是不改名字。这个办法有好处，也有缺点。好处



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缺点是全国只有你们一家，那不是很孤立吗？现在又不可以不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一登全国都要叫，否则人家有意见，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这样不好办。第二种是全国都改，那么就要发生上面的问题，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旗号，承认不承认的问题。第三个办法上海改一下，和全国一致了。可以早一些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不想改，那么你们就叫一个时候吧！主席的基本思想是怕挫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又要找到一个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同志们，从这儿可以看到毛主席看问题站得高，看得远。考虑一个问题，反复考虑。比我们细腻得多，他提出了我们根本没想到的问题，这包括我在内。同志们也没想过，还有什么国号问题，承认不承认问题，根本没想过这些问题。那时很多同志主张搞公社，我们也觉得不错，叫公社也可以，所以一弄就干起来了。当然我们也报告了中央。可是没再往下想，有些时候脑子里也想过：什么人叫社员？农村里地主富农不能当社员，那么上海人民公社什么人能当社员，什么人不能当社员？这个问题将来怎么解决？因为脑子里有点热，就没往下再想。但主席考虑问题反复的考虑，非常注意保护人民的革命热情。最后，中央在会议上讨论了主席意见，同意了全国的临时权力机构名称不叫人民公社，但文件上加了一句“除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给上海革命人民留了一个余地，你们上海自己考虑考虑。所以主席考虑问题非常周到，细腻。特别对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他就是怕挫伤。我们临走时，主席还问：“你们怎么样？能不能说得通啊？”我们说：“我们上海人民总是听主席的话，主席讲的大家都会听的”。我们回来后，公社委员会开了扩大会议传达了，没有发生任何争论大家一致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给我们留下了余地，我们完全考虑了，考虑结果，还是一致根据毛主席指示，还是把上海人民公社改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从今天会议上大家的情绪来看，更加证明了我们向主席讲的话不是假话。我们相信全上海的革命群众组织，全上海的革命群众一定会同意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现在有人造谣说：“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毛主席才不批准的。”还有人说：“因为红革会没有参加，所以人民日报没有登”。还有什么往街上贴了什么七问，八问，十问等等。现在就请这些人把你们这些问题统统收回去算了，我们不过是改了一个名称。上海的政权，党权，财权，文权统统从旧市委、旧市委手里夺到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这一事实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

有那么一个人，他在一个会上说：“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这口号是错误的，理由就是这个公社是少数人搞起来的。更确切些我说穿了，就是因为没有包括他在内。那我可以明确地表示我们的意见，这个口号“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与一切权力归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样，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口号。因为这口号实际意义，是一切权力归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的上海人民。也就是说，把一切权力从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回到我们自己手里来，这样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政权是不同，不会和任何一个人野心家一个小集团来分享政权的，它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别人没有资格来讲话。那一种说“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数人搞起来的”的人，如果他不是别有用心，那至少是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一月革命”。

“一月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是上海的无产阶级自下而上地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个革命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工人阶级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不愧是二十世纪六十年的革命英雄，他们冒着极大困难，英勇地挑起了革命和生产的重担。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的“一月革命”，我们还在想，实际上上海的夺权是从去年12月下半月开始的，那么我们夺权也不是等到成立人民公社委员会开始，而是我们当时看到铁路不通了；港口阻塞

了，赤卫队要搞“三停”这样的危险，而市委在那里继续在搞经济主义妖风，使上海已经处于瘫痪的状态。这时候我们如再不夺权，不要说还有一个月不夺权，如一月初我们不发《告上海人民书》《紧急通告》那我看不要一个月再有十天上海就不可收拾或者说我们收拾起来就更困难了。我们的夺权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真正的自下而上夺权。人民公社成立时，我们实际就拿了市一级的权，市委已停止活动了嘛！实际上十一月六日的大会上，宣布不承认曹获秋是市长了吗，我们早已经夺了权了，人民公社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把一月革命的成果从组织上作一个组织形式的表达就是了。正因为是这样，就是有一个深厚的群众基础的，所以党中央，特别毛主席一看到这现象就发现了一个事物，就自下而上地夺权。这是毛主席发现的，才亲自批准了《告上海人民书》《紧急通告》。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个单位的贺电，这样深厚的群众基础怎么能说是少数人搞起来的呢？还有人说什么是我搞起来的，我谢谢你们，我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如果没有上海的千百万群众自己起来夺权谁也搞不成这个局面。

我们的同志有这样的口号“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上海人民公社”，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壮烈的口号。它表示了我们有决心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今天把名字改一下，但这并不是改变了我们的决心，我们还是要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有那么一小撮人，人很少，只有那么一小撮，他们被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或者还没有说成那么更坏，至少是被一种思想，被一个“私”字迷了心窍。这种人，你们永远也不懂什么叫“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人民公社”。如果还有谁想在上海人民公社改名字的问题上做一点什么文章的话，我劝你们不要再在这方面打什么主意，这方面没什么文章好做，在这上面做文章，是不会有有什么好结果的。

上面主要讲了夺权问题，后面问题就比较简单了。

## 二、抓革命、促生产

这方面中央的文件很多，昨天报纸上已发了“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这几天陆续发了“关于给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关于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通告”，还发了小学、中学、文艺界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文件、还发了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文件，还发了关于机要，保密档案的文件，还发了许多文件。这些文件都是中央经过反复地调查研究讨论写出来的。例如小学开学不开学的问题，我们没有回上海以前，12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过好多次座谈会，反复征求意见，征求小学教员意见，学生意见和家长的意见调查几个月才下决心的。中学也是这样。这些文件，例《红色工人》文件也是调查很久。我想不再一一解释了因这些文件已发出来了，我们的任务是要坚决执行。问题是我们现在能不能执行，能不能贯彻。这问题首先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要下决心，想尽一切办法来保证党中央的指示得到贯彻。

今天到会的，除去各县来的同志，但毕竟到会的农民同志少，大家现在是听广播，到这个会场的是城市的人多。我们希望全上海同志，当然首先是贫下中农同志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能保证今年农业有一个好的收成。同时我们也希望，城市的同志能从各方面支援农业，因为农业的最大特点是有季节性的。有的晚了一天就会影响收成。我们不管搞什么革命都离不开一条，今天我们到会的同志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要吃饭，如果吃饭成了问题，那我们别的事就难办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农业搞好。但搞农业也好，工业也好，其他很多问题也好，都是要抓革命。不干革命，生产是上不去的。但在这里我想应解决一个思想问题。要抓革命促生产，那就要把时间都化在革命上，就侵占了生产的时间，而且用得很多，而且用的时间多，用的劳动力多。好多基层组织大量人脱产，好多农村公社的群众组织，一个生产队人不多，但脱产的人员很



多，这是不利的，不好的。

林彪同志曾经讲过，我们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应放在第一位，革命应该放在第一位。但时间的安排不应把革命放在第一位。而是要把生产放在第一位。各工厂一天要八小时安排生产，否则生产要打乱了，促生产就没办法促了，你商店还不至八小时，农业不是算八小时工作制的了，特别是春耕大忙要来了，时间，劳动力更加紧张，我们抓革命就要按这样情况来考虑。

在此，特别要对目前还留在城市里的给农村的同志讲几句话。包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同志，支援内地的工人同志，还有一些回乡支农的工人同志，还有到新疆去的青年同志还有他们的家长，我希望你们能很好地学习一下中央的这个文件。你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内地去这个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是非常光荣的。过去这样做，将来还要这样做。如不把农村搞好、不把内地建设搞好、不把边疆建设搞好，我们上海建设得再好也没有用。而上海的今后任务仍是支援全国的农业，支援全国的农村，支援边疆，支援内地。我们的生产是为全国服务的，我们的工业也是为全国的。我们同志们应记得，柯庆施同志就是为了关心内地建设，才抱病到四川去的。而且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在那里去世的。他最后还是那样关心内地建设，那为什么我们不应该继续这样呢？有些人现在抛弃了自己光荣的革命工作岗位，跑到上海来。有的人跑到上海要求报户口，重新安排工作。达不到目的就去斗里弄干部，斗工厂干部。我们认为这是不应该的，是错误的。有一些人吃了国家的饭，不为人民服务，在城市里干了些坏事，那更是错误的。新疆建设兵团的，那因为内地去的人大量回到上海来了，他们那里农业生产已经受到影响。我们崇明岛，长兴岛一些国营农场因为一些青年同志跑回市内来了，那里的生产就完全停顿了。有的农场，去年的稻子都没有收，棉花还在地里。听到这消息我们非常痛心。上海的一些学生同志他们听到这消息非常痛心，现已有几千人跑去抢收了。那为什么原来应该在这个岗位的人不回去呢？我们特别听到，在几个大饭店里，听说和平饭店里就住着国营农场的工人，那么我们就请问这些工人同志：“你们住在和平饭店做些什么？”你们的岗位是在你们的农场嘛！你们住在和平饭店要学坏的。你们应快点回去。而且你们中间在下乡上山青年中，从外地回到上海的人中间，有那么一小撮人是坏人，他们在那里不干好事。我们的青年同志、革命工人不要上他们的当，应按中央指示办事，回到自己的光荣的岗位上去。现在春耕已经开始了，应该回去了，你们是有实际困难，我们知道。但是这些困难应该按照正常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这种事作借口就不回去。有些从贵州、四川回来的同志，我们也知道，我在北京看到一些电报，贵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厉害，压迫过你们。那现在改变了嘛！贵州已是先进的地方了嘛！你们都应回去与那里的工人同志团结一致闹革命。支持贵州革命委员会，去进行夺权斗争。不应该在上海了，留着了。有些人现在劳动纪律很不好，一天名义上出来造反，实际上是没什么反可造，就是逛大街玩，当然这不是所有的人，有那么一部分人。我觉得如果同志们真的支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话，就应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因为这样懒散散不是工人阶级的本色。我们革命造反派同志是在最困难的时候都顶上去的。应该向这些同志学习，回到生产岗位，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违背这个方针，也不能违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些规定。我们赞成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的意见，对有些人他们这样不顾劳动纪律就应该加以考虑。第一：如果教育了，劝了，还不回去就应停发工资，因为国家不能这样拿钱养人，实在不行应该开除。如再干坏事，就应受法律处分。我们上海的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上海今后还是会往外动员人口的，所以想在上海市内安排工作，希望不要抱这个希望，没有什么希望，死了这条心吧！对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我不想再多讲了，就讲这么一点，我把话说死一点是为了我们这样大家都死了心大好办事，才能回去。

镇压反革命这方面用不着多讲，上海这地方同志们总记得，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上海不但有中国的地、富、反、坏、右，还有外国的地、富、反、坏、右。他们人数不多，只有那么一小撮，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他们，在战术上要重视他们，镇压反革命问题不能粗心大意。现在情况很复杂，需要我们很好地观察、特别是我们广大的群众。要擦亮眼睛，因为现在情况复杂性，就是有许多反革命。他们说：“我是反革命”，这就好办了，他不是，现在有些是打着造反的旗子，有的是削尖了脑袋，钻到造反组织内部来了，这一点我们全上海的革命同志都应提高警惕性。我们镇压反革命的方针从来是毛主席的方针，就是要靠专政机关、靠人民军队、靠公安局、同时靠专政机关和革命人民的结合。这样充分的群众路线，如果我们广大革命群众起来了，那么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用什么方式活动，他们搞秘密活动也好，搞公开活动也好，我们就容易识破他们，这是一个，希望同志们提高警惕性的。第二希望我们人民解放军、公安机关要加强的工作；同时，我们地方的革命造反派要全力支持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同志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革命委员会或我们的上海文化大革命，有最强大的支柱是人民解放军，不但有陆军还有海军，空军，这是我们最可靠的支柱，他们为了支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为了支持各革命造反派，他们已做了很多工作，在这里我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向上海的陆海空军指战员的同志们表示深切的感谢，同时向人民解放军同志们保证，如有人攻击你们，如有人对你们采取冲击军事机关那样的行动，我们全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坚决和人民解放军站在一起。当然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有的地方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指示实行军事管制，但那个地方有的组织他们说自己是革命造反组织，有的预先谈过话，应该服从中央命令，要实行军事管制就实行，但那里的组织里边的当然是很少的，竟然不执行军事管制，甚至把军事管制的命令划了叉叉，而且对军事代表围攻，我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这些单位的犯过错误的人如果他们真正是革命造反派的话应先作检查，向军事代表赔礼道歉，如他们不这样做，我们将要采取别的措施。

另外，还应说一点现在市面上造谣很多，谣言造得越来越离奇，有些人也不多，但他们就是专靠造谣吃饭。有那么一位接管市委的，突然发了一个什么总理的四点指示，我想到这个指示奇怪呀！中央既然有这个指示不会不告诉我们的吧！后来我们就打了电话到北京问，根本没有这回事。但可以假冒中央名义到处散发是总理的几点指示，当你问他时，他告诉你“不是总理，是伯达同志指示”。再问又说：“不是陈伯达同志的，是从那里听来的”。居然可以这样冒充总理的名义到处去造谣，红革会的人也干这个事，说是中央文革一月廿九日电报是假的，然后又从北京打来一个电话，说总理经过总参，经过总参又告诉上海的红革会，又是总理，又恰恰是四点指示，总理好象专门发四点指示，说什么“红革会是不对的，张春桥派兵也是不对的，”各打五十大板的样子，根本就是胡说八道，总理从来没有过什么这样四点指示。上海的红卫军发过二次特大喜报，一次特大喜报是总理讲：“毛主席、林彪同志讲转复军人不要单独成立组织”。但总理讲上海可以例外。又一次特大喜报，总理说，全国的红卫军都不好，就是上海的最好。总理从来没有过什么这样四点指示。这些东西我本来一到上海就知道都是谣言。这次我们在北京开会，当作笑话给总理讲了一下，大家笑了一场。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毫无一点影子。还有一些谣言，造到我身上来，最近我看了一下关于我的谣言，多得很，我简直一点也没有办法。比如说，有一张传单，说我给三军的同志谈话，谈话时说到什么工三司如何，如何。我在这里负责声明，我和三军的同志的谈话是多次，但是从来没有谈到什么工三司。那个谣言多啰，又是什么我们在北京，突然国务院接待站打来电话，说上海一、二、三兵团，工三司代表来告状，告上海的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告王洪文、潘国平和我，还告我。而且里面说上海那一天五十万工人游行。你们在上海的，你们







忙，你们最好一天拿四小时读书看报。同志们，在座的同志们、你们就不能拿两个小时啊？同志们，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们各个革命造反派，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我们有信心，不管阶级敌人多么猖狂，他们打不倒我们的。但是，堡垒是容易从内部突破的，如果我们自己搞不好，如果我们不是坚决地完全地按毛主席的指示做，如果我们不是经常的，不断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认真的改造我们的世界观，那可能坏事在我们自己手里，所以我在结束我的讲话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一定要很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有最大的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在毛主席的关怀之下，在党中央的指导之下，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我祝同志们身体健康，祝同志们在工作里面取得更伟大的胜利！